

狠刹私人会所歪风

今年5月,中纪委发文严打会员卡腐败,要求做到“零持有、零报告”。舆论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反腐败将从公开场合向私密领域延伸,会所腐败正是会员卡腐败的典型领域和重灾区。可事实证明,那些背景特殊的私人会所受此影响极小、八项规定让公开的高档消费场所生意大不如前,隐蔽的私人会所反而因此受益,因为其严密的安保措施“让领导们很放心”。

“会所中的歪风”是一种“私人订制”的腐败,要严肃反腐,就不能留下死角。从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再到如今治理“会所里的腐败”,让那些隐秘的地方见到阳光,这是公众所乐于见到的。之前种种举措都没能让“会所中的歪风”有所收敛,已经充分说明,治理会所腐败还需在政策上更加下大力气。

要让阳光进入,不仅要党员干部作出“不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的承诺,更要从会所本身的存在合法性入手,使其营业行为透明公开。特别是,一些地方将风景胜地、公园等公共空间变为私人会所的情形屡见不鲜,这

是对公共利益的严重侵犯。像这样的私人会所早就应该取缔,因为公共的风景名胜和景区资源不应沦为有钱人的自留地。此类私人会所泛滥存在,背后是否涉及权钱交易,本身更该被深挖追责。

很多城郊地带大量存在的私人会所,又是否有合法的经营证件,其经营范围到底是谁定的,面向的服务群体又有哪些?所谓“私人”,是否意味着其本身并不具备对外营业的资格?如果它们像赖昌星的厦门红楼,并不存在营业行为,至少也应要求其去相关部门登记备案;如果存在营业行为,宾

馆和酒店尚且要登记客人入住信息并与公安部门联网,那私人会所更应如此。

要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必须首先规范私人会所的经营行为,取缔不合法的私人会所,严格私人会所的监管,使其公开透明起来。另一方面,则应鼓励全社会和反腐部门一道“盯住党员干部”,严肃查处官员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严格责任追究、及时通报曝光。一手抓官员出入会所,一手抓规范会所经营,这样的“两手抓”必能刹住“会所中的歪风”。

远没到“官不聊生”这一步

毛建国

除了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新闻外,这几天与官员有关的新闻还有很多。比如,行政诉讼法在颁布实施20多年之后面临首次大修:行政机关将不得干预、阻碍法院立案;将扩大受案范围,可口头起诉;异地管辖后,有望减少行政机关干预审判;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可拘留行政官员。日前出台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明确规定:各部门召开本系统全省性工作会议,每年不超过1次;省委书记、省长出国(境)每年不超过1次等。这些新闻都与官员有关,都给官员戴上了“紧箍咒”。受此影响,很多官员感慨,现在官不好当了、当官没意思了,甚至有些官员还生出不小的怨气,将此称为“官不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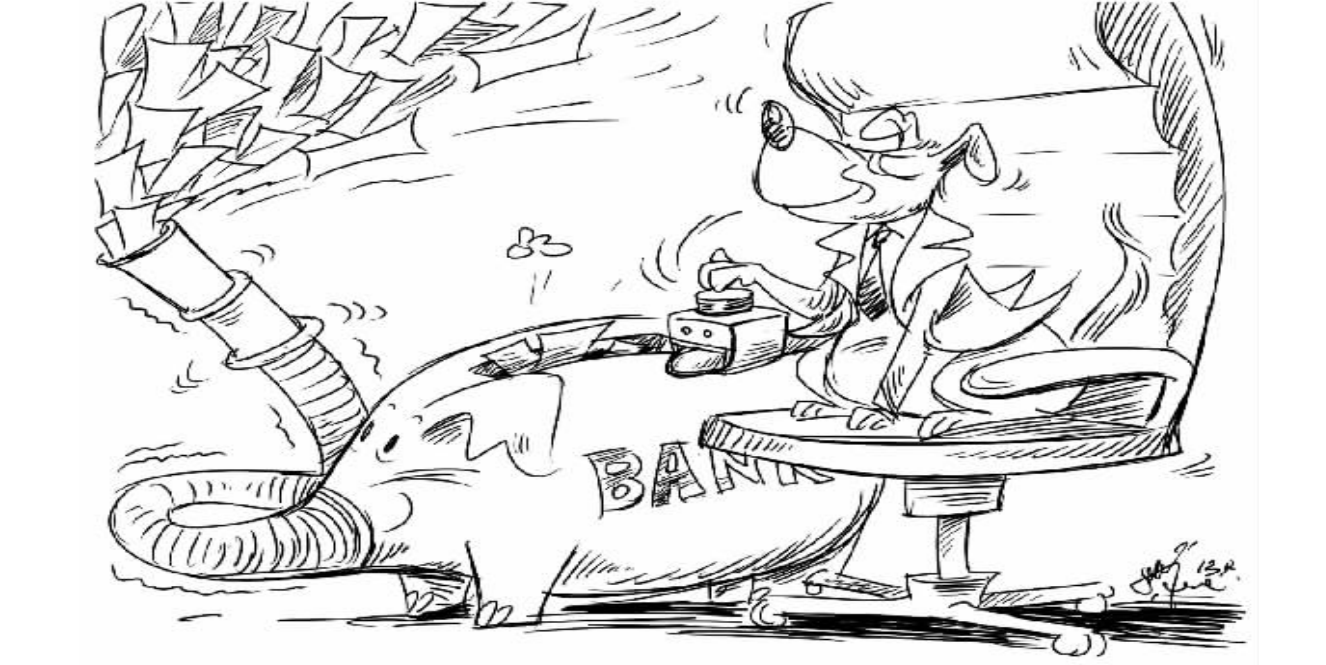
有人讲,“官不聊生”是一种进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就认为,官不聊生是判断发达还是不发达的一个标志。这方面说明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反“四风”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过去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相对宽松,使一些官员把滥用公权力当作家常便饭。随着权力一步步被关进笼子,估计还会有更多的官员觉得不自在。

但是,“官不聊生”这一用词很不准确,而且有点矫情。现在的情况真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吗?分析这两天几则新闻,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指向的是奢侈浪费甚至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诉法大修,对哪一方面着,这些新闻对应的内容都是不该发生的,都是老百姓反响强烈的,都是影响党和政府健康形象的,都是与现代政治要求相背离的。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这些本来都是官员应该做到的。一个官员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才有资格为官,做不到这些根本就没有资格为官。某种意义上说,这和道德领域一个公民不偷不抢不讹人、市场领域一个企业不黑不诈不昧良心差不多,这只是一点底线要求。达到这个要求,未必饿死人;达不到这个要求,必然依法惩处。事实上,按照德能勤绩的标准,对照身上肩负的责任,官员需要做的还有很多。现在权力刚开始被关进笼子里,便觉得不爽不安,就担心“幸福时光”一去不返,恰恰说明一些官员有着不健康的权力观。

“会所中的歪风”非治不可,“公费出国”不管不行,“畅通民告官”势在必行……不是官不好当而是本就那样,不是官不聊生而是为官常态。官不聊生是进步,但现在还远没到这一步。把这理解成“官不聊生”,感慨“官不好当”,这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必须看到,随着反腐败不断深入,反浪费不断加码,权力一步步被关进制度笼子,官员要做的还有很多。即使如此,依然只是底线,并非拔高要求。

“小狗当行长也赚钱”何以破解



邓海德

第七届南京大学EMBA年度峰会暨2013江苏金融论坛上周六在南京召开,与会的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论坛上痛批银行暴利,称银行变成了高速公路,坐地赚钱,即使将银行行长换成小狗,银行也照样能赚钱。《扬子晚报》12月24日)

“小狗当行长也赚钱”,这当然是笑谈,但国内商业银行稳居土豪之位,却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年初,权威媒体曾援引一银行行长的感叹,称“银行利润太高了,都不好意思公布”。时隔一年多,在近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布的500强竞争力指数名单上,银行业盈利指数位列第一,赚钱的前10名都是银行。比起制造业,银行业利润更是高得出奇。

现代金融业的逻辑起点是实体经济,两者按理应该唇齿相依才是。只是,如今国内的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利润反差与日俱增:2007-2011年间,500强中的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只有500强总和的30%;同期,我国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

总额平均只占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额和占500强总和的30%。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2011年,银行业平均净利润仍高达40%,每天净赚25亿元。一边是商业银行“长生不死”、日进斗金,一边是实体经济命途多舛、小微企业苦苦挣扎。

有人这样总结中国的银行赚钱银行,“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它进货是实行计划经济,而出货的时候实行市场经济”。具体而言,一是利差,二是佣金,三是融资,即拿着负利率的小客户,集腋成裘地将资产送去银行转账经营,回头还要被“国际惯例”地摊上一笔没法博弈、没法讨价还价的佣金。

今年有几则新闻可对照阅读:譬如1958年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存了26元钱,时隔55年后,长沙县春华镇松元村的龙孟雄还能取到钱吗?答案是没有让你倒贴就算够大方了;又譬如1989年,丹江口市民康忠奎夫妇办了一份银行保值储蓄业务,注明“24年到期后本息共22万元”,可今年到期取钱时,却被告知存款单失效;再譬如四大国有银行均已制定短信提醒费用收取标准,消费者一度习惯了短信提示“免

费午餐”宣布告一段落……

近日,中国银监会表示,正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未来要让市场说话、让资本说话。这里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恰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提出的,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银行业依靠利息差“躺着就能挣钱”的好日子或将一去不复返。从去年6月央行首次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到今年7月央行全面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再到央行最近发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利率市场化已经不再是传说。

二是未来民间资本大量进入金融业,将展开与银行的竞争。9月29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今年以来,国家工商总局已核准10家涉及银行的企业的名称,仅9月以来便已核准5家。民营银行放开明显提速,这也倒逼银行业加快自身改革步伐。

银行赚钱未必是坏事,但应取之有道。如果真是“小狗当行长也赚钱”,谁会是最后的冤大头呢?

漫画:徐简

官员出访“规矩”要细密更要公开

胡印斌

山东省日前对国家工作人员因公出国“约法三章”,规定厅局级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原则上2年内不超过1次或1个任期内不超过2次;出访团组总人数不得超过6人,严禁组织“团外团”和携带配偶子女同行;正省级领导、副省长每年出访不超过1次……(中纪委网站12月23日)

上述“约法三章”中,不仅有次数、任期、职级的限制,还有团组人数的限定、包机与否的限定等等,还特别强调,这一具体规定乃因公出国的最高限量,并不能曲解为可以享受的因公出国待遇,更不能据此要求轮流出国。

这样的规定显然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一直以来,对于官员频频出国甚至变相公款旅游的行为,社会公众多有诟病,有关方面也曾出台了不少禁令,三令五申,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就这样被众多官员开了洋荤。山东省这一规定,至少从“降低总量”、“减少财政支出”这一层面上讲,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

不过,这样按照官员级别确定出国次数的规定,不免有“一刀切”的嫌疑。有网友就质疑,控制官员公款出国为何一定要规定次数?这样的限定会不会将那些“真实的需要”也一并砍掉?官员如果确实出于工作需要而要出国,

则这样的“高压线”未免束缚了手脚,进而可能会因此影响工作;如果确实没有出国的必要,则只是因为这些官员达到了一定级别,则出去一次都嫌多,都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山东省这次之所以不论“需要”,只讲“职级”来确定出国次数,恐怕也有其无奈之处——“需要”存在太大的弹性空间,不好掌握,难以认定,也会给一些官员预留出闪展腾挪的空间,而“职级”则是刚性的,简便易行,也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这也暴露出权力运行过程中由来已久的“两难”困境。

这一“两难”困境并非完全无解,既然问题出现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则只能从约束权力上来破题。

首先,相关部门应清理各部门的“权力清单”,并据此来确定因公出国的需求,有些本来就属于外向型的职能部门,当然可以适当放宽出国次数和频率,决不能“一刀切”,而有些并不需要出国的部门,则可以“零”出国。

其次,各单位部门官员因公出国,要做到彻底的信息公开,出国的具体事由、经行线路,自然要事先向社会公开,归国之后更要公开具体花费,接受社会监督。这些信息不应该继续保密。惟有彻底地公开,方才有可能真正遏制住官员公款出国旅游的风气,而且还不至于影响“真实的需要”。

众多体育明星被骗 难道只因贪心

王石川

谎称父母是高官,以能买到低价房和车为由,王■伙同朱双双先后骗取杨云、罗雪娟、王丽坤、冯■等文体名人以及在内的33人钱财6000余万元。近日,北京市二中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新京报》12月24日)

如此之多的体育明星被骗,委实令人惊愕。不过,这并非个案,王励勤、张怡宁等体育明星此前同样被骗。这两起案件有一些共性,比如,骗子都是年轻女子,都声称可帮体育明星买到低于市价的商品房。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涉案金额数百万元,一个涉案金额数千万元,不知道王■是否受前案启发?

对于体育明星一再被骗,有网友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体育明星特别是奥运冠军不差钱;二是他们书念得少,社会阅历不够,辨别能力差。这两个结论无不道理,其集体被骗也与贪婪有关,即一听说王■可买到低价房,便毫不犹豫地上数百万元,尽管这些体育明星与王■并不熟悉。

有人妙解“贪”字:贪乃今贝,今是眼前,贝是钱财,急功近利,人心不足蛇吞象,难免出事。正所谓“天上掉馅饼,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许多时候不是骗子的技术高明,而是被骗子妄想占小便宜,结果却吃了大亏。比如一些虚假的中奖信息,有人上当正是因为看

中了骗子抛出的诱饵。

具体到此次体育明星集体被骗,还有更值得追问之处,即他们之所以相信王■能买到低价房,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生活中看到或听到有人享受特权,确实买到过低价房;二来他们相信王■神通广大。因为王■自称父母是部级高官,母亲在中央工作,能以成本价买房子;王■还让朋友假冒领导的女儿给别人打电话、发短信,证实自己有低价房产。

不妨作一假设,王■的父母如果真是部级高官,也许果真可以拿到低价房。毕竟,有时连厅级官员的亲威都能拿到低价房。去年媒体不是披露了这样一起闹剧嘛:深圳一女子自称找了“政府的关系”,从开发商手中拿得批条,可以7.8折购买两套大南山紫园别墅,低于市价800多万元。不过事后,开发商反悔了,原来,他一度以为该女子真是深圳某厅级官员的亲威,因此才以成本价卖房,后发现不是,遂不愿意再将房卖给该女子。原来,官员的亲威这么好使呀!很显然,正是因为现实中大量存在官商勾结或权力可变现、可享受开发商青睐的情形,王■心领神会,活学活用,才冒充官员女儿谎称可拿到低价房以行骗。

骗子是可恶的,被骗是可悲的,反思维体育明星集体被骗,与其嘲笑他们反占便宜,不如追问骗子骗术不高为何屡屡遂愿,更不如追问谁“教”会了骗子们骗术?

自由谈

毕夫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4年敲定的六项主要任务中,保证粮食安全被置于首要位置,还特别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亿多吨,同比增长2.1%,也是中国粮食第10年连续增长。

如此喜人的产量并没有改变中国“丰年缺粮”与粮食进口比率不断增高的尴尬——过去十年中,除2008年、2009年外,其余年份的粮食生产都是产不足需,而且缺口日益增大。截至2013年7月底,我国今年进口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达1143.9万吨,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而且被官方视为“口粮”的稻米和小麦的进口量日新增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表示,中国2013年超越埃及之后,成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进口量达650万吨;同期中国将超越尼日利亚,首次成为全球最大

的大米进口国,进口量达300万吨。

中国“三大口粮”净进口的局面,在短期甚至长期内可能都会处于“不可逆”状态。

进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内粮食自给能力的下降,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不足86%,与官方95%的目标相去甚远。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来平衡国内粮食供求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将粮食安全系在别人腰带上,难度系数将越来越大。自1990年以来,全球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人口却增长了10%,人口增速大大快于粮食增产速度;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全球粮食产量必须提高50%以上才能满足需求。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8亿吨到20亿吨之

间。目前世界粮食库存已由10年前消费量的30%下降到不足15%,处于近30年的最低位置。FAO的研究报告显示,未来20到50年间的农业生产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全球超长期粮食安全难免不受重大影响。如果再加上日益泛滥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浪潮,中国未来粮食进口的风险会逐步加大。

粮食供求的长期紧平衡是徘徊于国内粮食市场上空的巨大阴影。据《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3亿,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届时国内粮食(不含大豆)的供给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2013年农民工人均粮食需求比农村居民和

城镇居民分别高119.14和51.04公斤,人均日消费粮食增加20%;动态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至少有2亿农民移入城镇,粮食供求矛盾将日益加剧。

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条件还十分脆弱。目前,中国耕地保有量为18.18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根据联合国耕地警戒线标准,当人均耕地少于0.8亩时,会发生生存危机,目前中国2000个左右的具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按照未来“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到2020年建设占用耕地用地3万平方公里(即4500万亩),减少的粮食产量不低于2000万吨。如果耕地下降到18亿亩以下,加上

构筑大国粮食“安全阀”

土壤污染、自然灾害等因素,粮食总产很可能下降至50000万吨——届时中国需要8000-10000万吨的粮食进口量,占到目前全球粮食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食土为本。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规划,到2030年,如果实现粮食95%的自给率,则2030年需要18.5亿亩耕地。在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提高粮食单产量就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粮食增产大约三分之一依赖于单产水平的提高,这方面未来还有一定提升空间。提升粮食单产的同时,通过改进中低产田,使其成为早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增效的高标准农田,也是一种增产的有效路径。

在向土地寻找粮食增量的同时,粮食存量空间更值得深挖。目前中国每年因灾损失的粮食产量约1000亿斤,如果每年能通过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防灾减灾和避灾等科学技术手段将受灾损失减少两成,那就相当于增产200亿斤。另外,全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约为8000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的15%,如果能够通过控制非食品工业用粮需求、发展节粮型养殖业、节约用种和加强粮食储存和保管等措施堵住产后损失漏洞,就相当于每年能新增约2亿人的粮食供给。

开源节流之外,通过制度性再造即转变农业经营模式应当是提升粮食安全系数的最核心环节。当前,在引导农民流向城市的同时,政策还应全力引导和支持城市工商资本向农村乃至粮食种植业领域逆向流动,以在置换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推动土地规模化产出程度,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土地生产效率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替代。